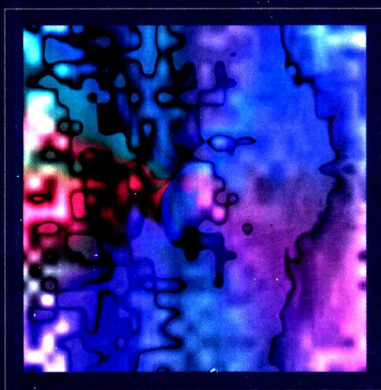


香港政治與選舉



鄭宇碩 雷競璇

APL857560-6

10.58
2007

香港政治與選舉

鄭宇碩 雷競璇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5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香港政治與選舉

鄭宇碩 雷競璇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和域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6852 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准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 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紹光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使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序言

鄭宇碩

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邀請，讓我和雷競璇博士有機會整理一下我們過去就香港的政治發展和選舉活動所作的研究，並在這基礎上完成一些新的文章，成書出版，成為「社會與思想叢書」的一部分。

香港的經濟成就，已漸為世人所熟悉。但香港的政治發展和選舉，似乎尚未有以中文寫成的專著。本港的社會科學學人，在研究方面多作雙線發展：一方面力爭在國際性的學報以英文發表學術論文，另一方面亦希望在本地社會作一些推廣普及和實證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從西方所吸收的理論學說，應用於東亞地區的研究，往往有所不足；而其間的推敲修訂，很多時能對現存的理論有所補充。

香港的政治發展，顯然不是傳統的殖民地體制理論所能概括。西方的政治發展理論亦未能充分解釋一個經濟發達、教育水平相當高的社會為何未有產生強烈的民主訴求。而「一國兩制」也自然形成了本港代議政制發展獨特的色彩。

香港的選舉制度及選舉研究正在起步，本地政治學者自然責無旁貸。雷競璇博士早着先鞭，在這方面作出成績。如何解釋本港選民的行為、這些行為與西方國家及鄰近地區選民行為的比較、有關理論的發展等等，都是我們應該繼續努力的方向。

面對九七的過渡和九四、九五年的三級選舉，我們希望

序言

這本書的出版，能坦誠的提出一些就算是尚未成熟的意見，讓社會人士參考，引發有意義的討論。我們抱着這種拋磚引玉的態度，期待着各方面的回應、批評和賜教。

一九九四年十月

目錄

序言	鄭宇碩	ix
香港社會的價值觀與態度	鄭宇碩	1
香港政治的現代化	鄭宇碩	35
九十年代香港的政治發展	鄭宇碩	65
香港的立法局選舉	鄭宇碩	83
——九一選舉回顧與九五選舉部署		
中英對抗與香港的管治危機	鄭宇碩	111
香港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的發展	雷競璇 尹寶珊	127
誰在1991年的選舉中投票？	雷競璇	159
1991年選舉中的「政黨認同」因素	雷競璇	201
為甚麼香港的選民不投票？	雷競璇	229
就選舉制度問題的爭論	雷競璇 黃宏發	269
探討雙票制中的「聯票效應」問題	雷競璇 馮榮錦	289
呈交立法局選舉事宜專責委員會的意見書	雷競璇	297
新界西選區兩次補選的研究	雷競璇	303
後記	雷競璇	329

香港社會的價值觀與態度*

鄭宇碩

香港的發展是如此迅速，以致本地居民也常常對其變化始料不及。他們的價值觀也同樣在改變。儘管對於一些問題的態度有着劇烈的變動，他們的價值觀仍然呈現出可被追蹤歸納的趨勢。*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前四卷中的數字的發表，為研究這個社會的價值觀提供了機會。本文即意在為理解Report系列中的政策議題提供有用的背景資料。

一 政治態度與價值觀

1 香港未來

政務總署曾就港人是否對香港的繼續繁榮與穩定持有信心進行了一項電話民意調查。回答有信心者的百分比從1990年7月的61%漸漸降至1991年1月的54%，又在1991年9月回升到64%，並且於1992年3月保持在60%。而在1988年夏由本港大專院校的社會科學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略過半數的被訪

* 本文原為英文，題為“Values and Attitudes of the Hong Kong Community”，載*Hong Kong Trends 1989-9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7-46.

者(55.5%)表示對香港未來有信心，僅有26.1%的人持反對意見。^①

公眾意見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如此引人注目的波動是一個既成事實。顯然，被訪者的信心與他們對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的信任有着密切關係。那些聲言是「中國人」並表示對香港政府滿意的人，往往對香港前途抱有信心。而且，他們對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愈信任，他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則愈堅定。

儘管人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相對較強，但信心問題仍是本地民意中最常見的問題之一。在最近兩三年政務總署的調查中，被訪者提到「香港前途」和「香港政治體制」是一個難題的百分比穩步下降(1989年11月為68%，1990年3月為54%，1990年9月為49%，1991年3月為29%，1991年9月為34%，1992年3月為21%)。在上文提到的1988年夏的調查中，47.7%的被訪者表示對1997年之前的政治動蕩感到憂慮，45.7%的人則不以為然。^② 1988年的調查中，從被訪者對1997年之後可能發生的若干社會經濟變動的預期，可以看出一種對香港前途的悲觀情緒。總計75.5%的被訪者認為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人權範圍的收窄是可能或很可能的。另外73.2%的人估計個人自由將減少；66.9%的人認為生活水平將停滯，甚或降低；61.1%的人則預計法律體制將受到破壞。僅僅42.4%的人認為現狀可以維持五十年，只有25.7%的人樂觀地估計香港人的生活將在1997年之

① Lau Siu-kai, Kuan Hsin-chi and Wan Po-sa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88*, edited by Lau Siu-kai, Lee Ming-kwan, Wan Po-san and Wong Siu-lu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p.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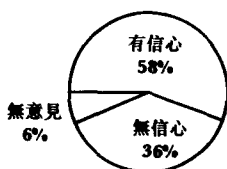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後將更加完善與幸福。與1986年調查的相關結果比較，可以看出人們對未來的態度是比較憂慮的。^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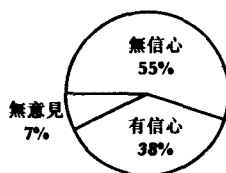
青年事務委員會在1991年1月進行了一次全港性調查，被訪者是15至24歲之間的年青人。他們對香港未來的態度似乎比整個社會的態度更為悲觀。共有48%的被訪者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42%的人則表示有信心。44%的被訪者認為，九七問題對他們的未來將有負面影響，23%的人認為這將會引起失業，17%的人認為將會引起經濟衰退，同時12%的人認為這意味着越來越少的自由。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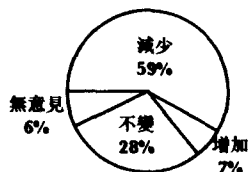
對香港前途，你有信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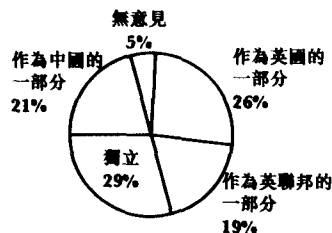
對於中國保持「一國兩制」的承諾，你有信心嗎？



你認為 1997 年後，香港人的自由將會減少、增加，或不變？



如果你可以把握歷史，你最希望 1997 年香港怎樣？



③ 同上，pp. 176-77.

這種憂慮源自對中國官方的許諾缺乏信心。1991年6月底的一項調查很好地反映了這種信心缺乏，這項調查由Asian Commercial Research主持並發表在1991年6月30日的《星期日南華早報》上（見上圖）。

事實上，民意調查在過去的6年裏一直得出上述同樣的結論。相反，商界對於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投資則表現出了極大的樂觀。

香港人對前途的態度存在明顯的矛盾，這取決於他們的選擇、機會成本和他們對香港和中國未來發展的評估。年輕人和有錢人比那些除了留在香港以外別無選擇的人更加擔憂九七問題。在上面提到的《星期日南華早報》的調查中，65%18到24歲的人認為他們的自由在1997年之後將減少，而只有49%45歲以上的人持同樣悲觀的看法。同樣，儘管家庭月入超過20,000元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二不相信北京會堅持「一個兩制」的諾言，可是僅二分之一的低收入者有同樣的疑慮。許多對中國的許諾表示懷疑的人對香港前途卻仍感樂觀，58%的人說他們對香港前途有信心，36%的人說沒有。有一點很重要，即42%的人雖然不相信中國會堅持「一國兩制」，卻依然對香港前途抱有信心。

似乎有機會移民的人大都傾向於選擇離開，以便獲得一張「保險單」。他們認為移民以後，他們才可以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有一個現實的評價。他們是否選擇離開決定於他們的機會成本。對商人來說，機會成本一般而言是太高了，因而他們大多傾向於獲得「保險單」之後留在香港繼續發展他們的生意。那些移民並且留在外國的商人，其機會成本一般較低，因為他們沒有較大的商業利益，或他們行將退休。香港確實正在流失大量護士，因為他們移民的機會成本很低。

大多數港人相信，民主在香港的前景極為有限，他們的自由在1997年之後將大為縮減，生活水平也將略有下降。但在「六四事件」後，他們從珠江三角洲的發展中獲得了鼓舞。在深圳與加拿大的愛民頓兩者之間，多數港人寧願選擇前者。即使香港在自由、人權、法制等方面將變成深圳那樣，他們也認為這是可以容忍的。可見港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的同時，又為之擔心。

調查表明，在「六四事件」的震撼下，155萬香港家庭中，約佔三分之一的家庭計劃移民。^④可是在過去的兩三年裏，表示已有切實計劃或已採取行動移民的人逐漸減少，猶疑不定者的比例也降低了。1991年11月，香港浸會學院和香港城市理工學院的學者進行了一項民意測驗，7%的被訪者聲稱他們在1997年之後將離開香港，15.7%的人說他們還未決定。^⑤這反映了港人對移民的選擇與機會成本的現實考慮。事實上，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西蘭和英國均面臨經濟困難，從而使移民之機會成本繼續增加。1991年10月31日在《南華早報》上發表的調查顯示，有成員在海外的家庭當中，有19%將有親屬，或希望其親屬在該年回港工作。這一比率超過了1988年的7%和1989、1990年的6%。去年以來，港人顯得並不熱衷與朋友討論九七問題和他們的移民計劃。他們可能現在已有所決定，並承認自己在政治上已毫無作為。有關中國的嚴肅政治刊物的銷量大降，而算命與占卜的一類則大受歡迎。

④ 《南華早報》(1989年7月4日)。調查由Survey Research Hong Kong在1989年6月22日至30日進行。

⑤ 《明報》(1992年3月30日)。

2 與中國政府之關係

對中國領導人關於香港前途的許諾缺乏信心，意味着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上文提到的由本港大專院校於1990年夏天和冬天進行的調查中，被訪者僅有10%說他們信任中國政府。與此對照，20%的人表示相信英國政府，42.9%的人表示了對香港政府的信任。15%的被訪者則聲稱不相信香港政府。這一調查還顯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產生了一種流行觀念，認為中港之間存在着利益衝突。可見中港雙方的共同利益被大大低估了。證據是，有一半的被訪者同意中港利益相互衝突的看法，而只有30%的人持相反的觀點。^⑥

另一方面，商界則完全認識到中港的共同利益，並尤為讚賞廣東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發表於1992年6月10日《南華早報》上的一項對美國商務部駐港人員的調查顯示，只有7%的被訪者認為對中國為期五年的投資項目前景暗淡，而在一年前的同樣調查中，這一比例卻高達31%，63%和30%的人分別認為，對中國的投資前景是「有利的」和「非常有利的」；而在前一次調查中，比例則分別為62%和8%。關於香港的投資環境，11%的被訪者認為此後五年是「不利的」，上次調查則為22%。64%和25%的被訪者相信香港此後五年的投資環境是「有利的」和「非常有利的」，較早時的調查則為69%和9%。

1991年9月的立法局選舉也反映了本地社會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激烈批評中國政府的民主派候選人贏得了壓倒性勝利，而親中候選人則全面失敗。1991年參加紀念六四事件主要活動的人數超過了10萬，1992年的人數仍然保持在6萬。如果

⑥ Lau Siu-kai, "The Social Irrelevant of Politics: Hong Kong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未發表), pp. 12-13.

有適當機會，許多港人會表達他們對中國政府的憤怒。在他們眼中，中國政府似乎應為九七問題給他們帶來的憂慮負責。但同時，與北京對抗並不被認為是可取之途。在上述調查中，75.1%的被訪者反對與中國對抗，僅有11.3%的人支持對抗。^⑦公眾對《中英就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的諒解備忘錄》的明確支持，顯示了港人試圖避免與北京衝突。據1991年7月8日發表在《南華早報》上的調查，61.9%被訪者贊同中英達成的協議，這一協議促使香港繼續它的新機場計劃。僅有8%的人不贊同這一協議。

但香港人是很難取悅的。一些人懷疑中英合謀欺詐港人，一些人為港人被排除在中英雙方的秘密會談之外而不快。因此，只有略多於四分之一的被訪者說，《諒解備忘錄》增加了他們對香港政府的信心，21%的人則不以為然。同樣，致力於與中方搞關係的政治家往往不被公眾信任。1991年12月29日發表於《星期日南華早報》上的一項調查表明，超過半數的被訪者相信立法局有權不顧中國政府，獨自處理終審庭、立法局委員會制等問題的爭論。香港人經常支持批評中國領導人的政治團體，然而與此同時，港人又無疑不歡迎與北京搞對抗。他們害怕由此會對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有不良衝擊。

儘管有反對中國政府的情緒，港人懂得他們必須適應中國政府的做法和1997年的變化，高級公務員們也意識到這種適應的必要。香港政府走在輿論之前，致力於「發展一種與中國各級政府的融洽與有效的合作關係」。港督衛奕信於1991年10月說的這番話引起了普遍關注。雖然沒有太多的人表示欣賞，但也沒有人表示強烈反對。香港人盼望一個「在1997

⑦ 同上，p. 13.

年的順利和成功的主權過渡」。他們假定這是港英政府的責任，儘管他們依然不願公開強烈地支持這個目標。然而變動將很快來臨。香港中文大學的劉兆佳教授於1991年夏季和秋季進行了一次全港性民意調查，76.6%的被訪者相信中國更多地介入香港事務是不可避免的。總計51.1%的被訪者同意中國政府應該在後半段過渡期增強它對香港事務的參與，只有17.4%的人反對。尤為重要的是，23.4%的被訪者認為中國進一步參與香港事務將有利於香港，15.7%的人則認為對香港不利，另外38.7%的人認為將沒有甚麼不同。^⑧ 1992年6月21日《星期日南華早報》發表的調查結果表明，39%的被訪者認為英國政府應對目前的《機場備忘錄》爭吵負大部分責任，僅有19%的人認為中國政府應負主要責任。

3 對香港政府的評價

1992年3月的政務總署民意調查中，41%的被訪者說，他們對香港政府的總體表現是滿意的，37%的人則表示不滿。在1990年夏天和秋天，本港大專院校的一些社會科學家就香港政府的表現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表明，略過半數的被訪者(52.6%)認為政府表現一般，15.1%的人認為表現不好，22.8%的人認為表現好。^⑨ 同一調查中，45.1%的被訪者表示對現存政治狀況感到滿意，28.5%的人表示不滿。同樣地，儘管有59%的被訪者認為現存政治體制是可以接受的，25.9%的人則並不完全接受。

⑧ 在此非常感謝劉兆佳教授提供的資料。

⑨ 同註⑥，pp. 13-14.